

知识理性、自由与极权主义的批判： 波普尔与哈耶克之比较

曾宪平, 陈 宇

(福建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福建 福州 350007)

摘 要: 在文本解读的基础上对波普尔和哈耶克政治哲学思想的演绎逻辑进行比较。分析认为, 波普尔和哈耶克虽然主要的研究领域不同, 但从相同的根本性前提和世界观推论出一个共同的哲学主题, 那就是对极权主义的批判; 就此而言, 二者不但出发点和结论是一致的, 并且在演绎逻辑上也相互补充, 相互支持, 共同对极权主义进行了有力的批判。

关键词: 波普尔; 哈耶克; 知识理性; 极权主义

中图分类号: B50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6248(2010)04-0077-04

波普尔和哈耶克都是 20 世纪重要的自由主义思想家, 二人致力于一项共同的事业, 那就是对极权主义国家或者有极权主义兴致的国家进行了警惕性的批判。虽然两人在根本性前提、世界观和思维方式方面以及许多推论相互契合, 但是其契合程度更加引人注目。因此, 在比较他们思想的契合性时, 有必要了解一下二者之间的关系。哈耶克和波普尔都是自我流放的维也纳人, 两人也从未在维也纳相遇过,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却远隔重洋保持着联系。1945 年, 在伦敦担任国民经济学教授的哈耶克电邀波普尔出任伦敦经济学院教授, 波普尔对此欣喜若狂, 随即接受邀请迁居伦敦。在伦敦, 两位学者开始了思想交往而且对整个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是什么欲望使哈耶克得以远隔重洋、超越专业界限发出这样一种邀请? 人们当然可以把它当作一种对流亡在外学者的同情或者情感行为来评价。不过, 这样一种解释过于肤浅。虽然两人此前已经相识, 但更重要的是哈耶克和波普尔之间思想上的投缘才是决定性因素。

一、知识的增长、分立与易错

波普尔最先是作为一位哲学家进入人们视野的, 而哈耶克于 1974 年获得诺贝尔奖, 更是与其在经济学方面的特殊贡献有关。然而, 两人不同的研究领域却始于一个共同的基础: 对知识的认识和理解。正是随着知识观的形成和在政治哲学领域的渗透, 二人开始不约而同地对极权主义展开了猛烈的批判。尽管波普尔和哈耶克的知识观不尽相同, 但是同为二者政治哲学思想的立论基础, 是其极权主义批判的逻辑起点。

波普尔的学术生涯始于对归纳问题的批评性研究, 他的证伪主义学说来自于对归纳法作为知识成长逻辑的质疑。古典经验论把归纳法视为从有限的经验事实向普遍的理性知识扩展的唯一有效的“通道”。18 世纪英国哲学家休谟提出了著名的“归纳问题”, 他认为归纳法不能证明普遍适用的科学规律和事物之间的必然联系, 因此, 在经验基础上用归纳法建立起来的知识是不可靠的。波普尔对这个著

收稿日期: 2010-03-18

作者简介: 曾宪平(1985-), 男, 湖南彬县人, 管理学硕士研究生。

名的“休谟问题”提出了独创性的解决方案。在《猜想和反驳》与《科学发现的逻辑》中,波普尔对归纳法进行了心理学理论和逻辑理论的批判。他认为,科学理论的内容不是平凡、琐碎的,而是大胆的猜测,并且在常识看来是不可信的猜测。因此,经验之所以能够成为理论的试金石,其真实原因不在于能够证实理论而在于经验能够证伪理论^[1]。

波普尔把科学的“分界”问题称作康德问题,他说:“如果我们仿效康德把归纳问题称作‘休谟问题’,我们就可以把分界问题称作康德问题”^[2]。在波普尔看来,人为自然界立法,但是人会犯错误的,这种“立法”可能是错误的,所以科学理论可能是错误的,而科学理论是可错的,这正是科学的人性方面。因此,科学理论既不是神学,也不是形而上学,它是可证伪的。也就是说,对于从某个理论推导出的陈述,在逻辑上总是可以找到与之发生冲突的某种事件。反之,如果这个理论与任何可能发生的或可想象的事件都不会抵触,那它就不具有可证伪性,因而不属于科学的范围。因此,他认为,所有的科学理论都是假说,是人们首先大胆地提出猜测和假说,然后努力寻找和这一假说不相符合的事例,并根据事例对假设进行证伪和修正,乃至完全否定,而也正是通过这种从问题出发,经过不断的猜想和反驳,再列出新问题的不断建构过程,科学知识才得以不断地增长和进步。

哈耶克从经济学视角提出了“知识分工”的问题。他认为,这个问题不仅与劳动分工问题颇为相似,也与劳动分工问题一样重要。正是在社会生活中存在着劳动分工,因此对应地存在知识的分工,因为不同性质的劳动所需要的知识是不同的,导致了“知识的分立”(分立的个人知识),用哈耶克的话来说,这是为不同的个人分散拥有的关于“特定时空之情势”的知识。他认为,并不存在一种整合了的社会知识,也不存在那种把全部知识都化约成“科学知识”的知识,所存在的知识无法加以组织地为无数个人所持有分立的个人知识,即使是理论知识,也是以巨大无边的“分立的个人知识”为背景和依托的。那么,这种关于“特定时空之情势”的分立的个人知识有什么样的特征呢?哈耶克认为,这是一种“知道那个”而非那种“知道如何”的知识,它是一种“可以发现的”或“可以传播的”和“可以阐明的”知识。这种“知道如何”的默会知识隐含于文化传统之中,但文化传统并不决定默会知识的具体内容,因为由个人所拥有的默会知识是一种依附于知道者本人

的、高度分化的个人知识。正因为如此,我们所运用的大量知识都具有默会的性质,我们知道的要比我们能够用语言表达的多,因此,在某些情境下,我们就只可能拥有极为有限的知识或没有知识,知识越发展,我们有可能越无知。社会生活之所以能够给人益处,大多基于如下事实,即个人能从其所未认识到的其他人的知识中获益;文明始于个人在追求其目标时能够使用较其本人所拥有的更多知识,始于个人能够从其本人并不拥有的知识中获益并超越其无知的限度^[3]。

二、极权主义之批判

哈耶克以知识观为基础,通过对建构理性主义的批判展开了对极权主义的批判,而其对极权主义的批判又主要是通过对社会主义的批判进行的。哈耶克认为,所有的集体主义社会,从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到斯大林的共产主义,都会无可避免地迈向专制极权,这些社会主义最终不过是深藏在多重伪装下的极权主义。由于对人类理性能力充满了悲观,哈耶克认为尽管人类的理智能够对事件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但是人类的理智是无法控制的,人类永远无法掌握足够的知识来控制自身所处的环境或者规划设计出更好的环境。实行中央计划的经济体制必须有一个小团体(统治阶级)或一个集中的机关决定资源和产品的分配和发放,需要“把所有知识集中起来”,这正是建构理性主义最明显的特征。从“无知”的知识观而言,这种建构理性主义的错误正是人们遗忘了知识的局限性,否认了人的必然的无知,从知晓所有事实的假设出发想当然地重新“理性地”设计社会制度的进程,集中计划发挥作用所需要的知识永远无法集中在一起。就理论逻辑而言,事实上掌握全部知识以重构社会也是不可能的,即使某个人能够掌握全部相关知识,但是他在运用这些知识之前,还必须掌握运用这些知识的知识,而这种实践性的知识只能在实践中生成,绝非事先可以掌握。一旦对于经济计划在实践上的不同意见,加上高层计划者在分配物资上的不断失败,最后将导致计划者开始运用高压的强迫力量以维持计划的实行,在经过这一连串的恶化之后,一个国家将会无可避免地通往奴役之路,转变为极权主义。这就是理性的自负带来的致命性后果。

波普尔所关注的是剖析极权主义的蛊惑力,尽可能地破坏其观念基础,最广泛地宣传自由的价值

和重要性,他从哲学意义上描述了哈耶克所表述的东西。他以批判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对立为轴线,展开了对开放社会的论证及其敌人——各种类型的极权主义的批判。在他看来,不迷信、不盲从的批判和探索精神是理性的精髓,他是这样一种态度,即承认“我可能错,你可能对,但通过努力,我们可能更接近于真理”^[4]。而这种努力正是他知识观中所阐述的不断猜想和反驳、证伪和批判的原则。科学不应屈从于任何权威,包括理论的权威,这种理性批判主义意味着批评和反批评的自由。

波普尔从柏拉图开始进行的对极权主义思想的清理,反证出人类精神发展史上令人沮丧的一面。可能毁灭人类自由的不是渐进的办法,而是乌托邦的社会工程。社会改造的乌托邦蓝图必定会过于简单,因此难以为独立的个人选择留下多少空间。对于什么状态可以算是一种理想社会,各种意见也大不相同。乌托邦的社会工程师无法容忍反常或不可预见的情况,恰恰是因为人类自由又可能使实现他们所展现的蓝图的努力落空。因此,即使乌托邦工程师的初衷是解放人类,他们也会情不自禁地采用越来越多的强制手段实行独裁甚至是极权主义。那种认为社会和人都必须为历史发展的终极目标服务和献身的历史主义,成为他毕生反对的东西,也不是偶然的。他从哈耶克出发,又把双脚扎扎实实地落在了哈耶克的地面上——历史主义等同于人的被奴役状态。

在波普尔看来,在封闭的社会中,不管是那些对灵魂不死作出承诺的宗教信条,还是对真理的确证性作出承诺的知识论以及对尽善尽美的未来社会作出承诺的历史主义,本质上都是借用一个权威给人心灵上的安慰,而人们摆脱对死亡、陌生世界以及未来的恐惧感,盲从于传统的习俗和观念,尤其是盲从于权威和权力。理性批判精神的丧失,使一小部分人掌握了对在社会上占统治地位观念的“终极解释权”,从而获得了不受制约的权力,这正是思想上的权威主义导致了政治上的极权主义,使得人的自由丧失,个性被抹杀,个人被否定。

三、渐进社会工程与自发秩序

波普尔和哈耶克的立场一致之处是,由于存在知识的僭妄和理性的自负之类的东西,社会理论中历史主义的宏观预测和乌托邦式的整体安排都是不可能的,那么两人从这一事实中得出什么样的分析

结论呢?

波普尔认为,开放社会可以使我们的知识以及我们进行“合作和互助”的能力大为增加,从而使我们的幸福和生存机会大为增加。根据波普尔的定义,开放社会应当是“每个人都直面抉择的社会”,开放社会的生存要依靠理性和一种人道主义的信仰,因此也意味着一种政治类型和统治制度——即民主、自由、平等主义,而达至理想的开放社会的途径在于消除人类苦难的渐进社会工程。波普尔根据证伪主义的原则,从伦理学的角度分析了“渐进社会工程”的科学性。第一,渐进社会工程的目标是“最大限度地排除痛苦而不是最大限度地增加幸福”。这是因为幸福和痛苦是独立的,一个不能补偿另一个的身心状态,而人的欲望无止境,利益得失也各不相同,所以排除痛苦的标准是明确的,增加人们的幸福却没有一个确定的标准。因此,这不仅是渐进社会工程的目标,也是政府权力的限度:人们各自寻求自己的幸福,政府则为他们铲除弊害。第二,渐进社会工程采取的是合理的、可行的方法,它主张尊重历史、保留传统,用温和的、改良的方法达到目的,用循序渐进的态度避免社会动荡和暴力破坏。它用试错法逐步消除点滴的错误,对社会进行零星改造,这样即使错了,损失也不会太大。和平改良的手段社会阻力小,容易被人接受,它先建设后破坏,不致推翻历史文化传统,以一种批判理性主义的态度切实地为社会消除祸害,通过民主协商取得公众的赞同^[5]。

哈耶克认为,使思想获得生命的是具有不同知识之间的互动,对社会进程作有意识的控制或指导的各种诉求不仅永远不可能实现,而且只会导致自由的丧失,最终通往奴役之路。文明始于个人在追求其目标时能够使用较其本人所拥有的更多知识,始于个人能够从其本人并不拥有的知识中获益并超越其无知的限度^[6]。在这一基础上,他提出了“哈耶克的终身问题”:自生自发的秩序问题。由于无知,我们必然要在互动合作的社会进程中生活,并且可由此保有自由,分立的个人行动通过遵循规则,可以实现社会秩序及公共利益,这是自发秩序生成演化机制的一般规则。自生自发的社会秩序所遵循的规则系统式进化而非设计的产物,这种进化的过程乃是一种竞争和试错的过程。竞争过程就是“发现的过程”,哪些物品稀缺或有需求,它们的稀缺或珍贵程度如何恰好是竞争所能发现的,竞争使得知识在更加开放的空间内进行更加优化的组合与传播。有

了竞争就有了选择。面对同一个问题,每个人都会有自己不同的解决方式,通过不断的试错可以使最优秀的方案脱颖而出,进步的动力也就源于此。在哈耶克看来,市场经济的价格和竞争机制近乎完美,即使它存在某些缺陷,也会随着历史的演变而自我修复和调整,但并不需要人为的整合,经验的积累和不断的完善可以使社会自生自发的繁荣,这就是哈耶克追求的“自生自发秩序”。

四、两人的影响和评价

人们在哈耶克的论著中总会看到波普尔的智慧,在波普尔的思想中也会看到哈耶克的身影。这是因为,哈耶克是在重新发现那些被不公正地遗忘的思想传统的意义上撰写其书,他从经济学和社会学角度论述的东西,总是能够从波普尔历史学和哲学的角度看到形而上的佐证,而后者在他的著作中与那些不知不觉影响我们行为的思想做斗争中所证实的东西,从理性意义上说,具有更为典型和宽泛的意义。哈耶克对“通向奴役之路”经济基础的揭示和波普尔对“政治乌托邦”赖以生成的致思方式和知识论基础的发现,互为补充,相得益彰,构成了对极权主义政治的两面合击,这在西方学术界至今仍被认为是很难超越的高峰。

然而,哈耶克和波普尔虽然都是自由主义者,他们各自的自由主义在政治观上却有一些不同的知识出发点。哈耶克首先是经济学家,他对自由社会的认识,是通过自由市场的理解形成的;而波普尔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是研究知识和科学的哲学家。波普尔的政治哲学无疑是在他对科学研究工作,对知识成长和一般理性思维的必要条件的分析上。因此,分开来看两人的理论,并非没有缺陷。波普尔的政治哲学过分关注人类理性的发展,热衷于为渐进社会工程的决策理论提供依据,却没有回答“社会组织的基础是什么”、“政府合法性是从哪里来的”等社会问题;而哈耶克虽然也深入到知识观的层面去建构自己的理论,但经济学家的身份使其难以达到专业哲学家的深度,而他的逻辑推论事实上也仅仅是一种概念的转换而已。正因为理论上的这些偏颇,导致有些人认为二者不过是学界的“流行歌手”,或通俗肤浅,或当红一时。

在论辩方式上,波普尔和哈耶克不是简单地对极权主义本身进行批判,而是深入到认知层面对其认识论基础进行分析解构,通过抓住批判对象最有

力和最吸引人的部分进行批判而将其彻底击倒。这种论辩方式不可否认是有力和难以反驳的,但是,也许是为了追求理论的完整性和不可证伪性,二者把许多不同的伦理哲学和政治哲学揉合在一起,因而在逻辑上显得驳杂和混乱。波普尔对历史决定论的某些道德或价值上的批判还有些过人之处,但其逻辑批判在许多地方都不合逻辑,如在《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中,他试图让反自然主义和泛自然主义的“历史决定论”相互驳斥,自己却在二者之间左右摇摆。而哈耶克在反对建构、论证自发生的社会秩序时,他认为理性不及,不能认识世界的真理,可是在论述个人自由和法治的时候,他又自觉不自觉地重走了康德的老路,要为这个世界立法,如同奥克肖特所揶揄的那样,哈耶克是一个理性主义的计划贩卖者,尽管那是一种“阻止计划的计划”^[7],这种不协调是哈耶克自己无法克服的矛盾。因此,以是否建构了一个完整的政治哲学的标准衡量,波普尔和哈耶克都不算成功。

尽管如此,波普尔和哈耶克的论证还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值得借鉴的结论。正如波普尔所认为的那样,国家是一种必要的恶:如无必要,它的权力不应当增加。可以把这条原则称为“自由主义的剃刀”。因此,他认为民主不仅仅是融合大多数人意见的制度,而是对滥用权力的警惕和提防,对权力的牵制和平衡,国家干预主义只能限制在保护性功能之内,应该是通过间接的、制度化的方式确保人民自由,除此之外不能拥有更多的权力。哈耶克也强调,“能够防范权力变为专断的,不是权力的来源而是对权力的限制。”如果个人仅仅是计划制度者心目中的一个零件,这样的社会是没有个人自由的,而能够尊重个人权利、限制权力的民主制度都是在那些竞争性市场发育到一定程度的社会形成并壮大的。只要政府的计划是为了促进竞争,或者是在竞争中无法正常发挥作用的时候采取行动,都不应该予以反对,除此之外的一切政府活动都是非常危险的。

五、结 语

“自由的代价是永恒的警惕”。波普尔和哈耶克通过自己的论证,使得“政府应该是有限的”这一观念已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他们沿着两位理论家的足迹,继续探索着通往“自由”之路。

(下转第 85 页)

- 书店, 1996
- [2] 勒·柯布西耶. 走向新建筑 [M]. 陈志华, 译. 太原: 山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 [3] 华 梅, 要 彬, 李美霞, 等. 现代设计史 [M].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6
- [4] 赵晶晶. 城市建筑设计的可可持续发展性 [J]. 美术大观, 2008, 21(4): 32-33
- [5] 吴 彬, 齐青萍. 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设计 [J]. 艺术与设计: 理论, 2007, 5(3): 19-20

Dialogue between contemporary ecological architecture design and “Bauhaus”

ZHANG Wei^{1,2}, LU Yong²

(1. School of Liberal Art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Jiangsu, China

2. Department of Art and Design, Hefei University, Hefei 230601, Anhui,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build the dialogue between contemporary ecological architecture design and “Bauhaus”, the authors explore the integration points between them, provide powerful examples for the modern ecological architecture and lastly carry out the research for contemporary architecture design. The result shows that eco-architecture design is a perfect form in combining eco-aesthetics with design and an ultimate direction of contemporary architecture design. Actually, the humanism and function rationalism in the eco-architecture design was embodied in the “Bauhaus”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Key word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rchitecture design; Bauhaus; humanism

(上接第 80 页)

参考文献:

- [1] 赵敦华. 赵敦华讲波普尔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 [2] 波普尔. 科学知识进化论: 波普尔科学哲学选集 [M]. 纪树立, 译. 北京: 三联书店, 1987.
- [3] 邓正来. 自由主义社会理论: 解读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M].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3.
- [4] 波普尔. 开放社会及其敌人: 第 2 卷 [M]. 陆 衡, 郑一明, 等,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 [5] 顾 肃. 论波普尔的开放社会 [J]. 开放时代, 2002, 21(6): 6-12
- [6] 梁 峰. 知识与自由: 哈耶克政治哲学研究 [M].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7
- [7] 莱斯诺夫. 哈耶克: 自发秩序的理论 [C] // 莱斯诺夫. 二十世纪的政治哲学家. 冯克利,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2

Cognitive reason, freedom and critique of totalitarianism: comparison of Hayek and Popper's ideology

ZENG Xian-ping, CHEN Yu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007, Fujian,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compare Popper and Hayek's ideas, the paper analyzes their deductive logic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thinking on the basis of text interpretation. The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in possess of different field of investigation, Popper and Hayek deduce a common theme on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critique of totalitarianism, which shows that both the considerations and conclusion are consistent. They also reinforce and support each other on deductive logic to a powerful critique of totalitarianism jointly.

Key words Popper; Hayek; cognitive reason; totalitarianism